

骑白马的彭湃来到什石洋村

□丁燕



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进程中，广东的党组织和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不怕牺牲，为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央苏区、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东江抗日根据地……这些红色老区的背后，是淬火成钢的精神品质，是坚如磐石理想信念，是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是代代相传的红色精神。在南粤大地上，有60个党建示范“红色村”，这是由广东省委组织部牵头实施的党建示范工程。这些红色村大多分布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如粤东、粤西、粤北的山区，是培育红色精神的摇篮，是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见证，是宝贵的历史财富。

不一样的村庄

“蔡元旧屋”的门头上摇晃着两盏酱红色的小灯笼。推开木门，内里是个窄小的院子。步入正厅和卧室，我感觉十分惊讶，木头房梁棕黑，木头窗户窄小，姜黄色的地砖。屋内摆设朴素得像铅笔画，无一物多余。屋子的侧旁，是“蔡应甲大屋”和“合兴泰粮店”——原中共普宁县委办公所在地和原普宁县委情报交通联络站。

追溯广东普宁市大南山街道什石洋村的历史，我发现这个村早在明朝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便有一支蔡姓人从福建建阳迁居至此。最初，这个小村的名字为“永盛寮”，因村前三坑溪环绕，乱石遍地，寮前开阔，故更名为“什石洋”。显然，什石洋是个“不一样的村庄”。在这里，既能看到“物的新农村”，还能看到“人的新农村”。什石洋村的巨大变化，得到了东莞对口帮扶工作队的大力帮助。

这个村没有明显的分界线，搞不清楚哪里是城镇哪里是村庄。到处都是灰褐色的房屋，到处都是弯曲的巷道。这里更像一个充满“红色文艺风”的主题公园。走在村子里，我发现这里的民居多为传统三合土结构的潮汕建筑“下山虎”“四点金”，古色古香。那600多米长的村道全部硬底化，路面干净整洁，路旁簇拥着绿树鲜花。练江上游，白马溪流什石洋段防洪大溪环绕着民居，水流清澈，能见到鱼儿游弋。路边可见石桌椅，旅游公厕和垃圾屋拾掇得干净整洁。傍晚时分，路面反射出橘红色的夕阳余晖，刚放学的男孩骑着自行车一闪而过。当暮色低垂，73盏路灯全部亮起，整个村庄变得格外璀璨。2019年，这个村被评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什石洋村不仅将历史人物故居修缮一新，还在普通民居的外墙上涂绘了巨幅壁画，书写着“抗日救国，还我河山”“白衣战士大摆地雷阵”“切不断的秘密运输线”等字样；在一片面积硕大的绿色果园门前，亮着簇新的招牌：“黄皮观光园”，园子侧旁则是红色文化广场，在红旗和五角星的雕塑下，有位卖气球的小贩被孩子们团团围住。砖红色浮雕墙上，那个梳长辮的女子和穿短衫的男子正在聆听宣讲。“文化长廊”里，那些黑白图片和翔实文字讲述着这里的几百年历史。我的耳边突然响起一位村民的话：“出现在这里的烈士都是有名的姓的，但还有很多人为了革命做出牺牲，却没留下自己的姓名。”

看到金色的“蔡氏辉祖祠”时，我下意识地停下了脚

步。这里不仅是一栋雕龙画凤、精致绝伦的潮汕建筑，还是一处革命遗迹。原来，早在1928年2月，这里便是普宁县苏维埃政府办公的地方，彭湃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开过会，讨论各区乡建立苏维埃政府的事宜；彭湃还在这里发动农民运动，领导土地革命。进入其中，是个敞亮的展览馆。墙上挂着120张历史图片和12幅领导题词，展示柜内有35件实物，包括“革命烈士英名录”、各种党史资料。这个祠堂见证了革命年代的艰苦岁月，成为这个村最为重要的文化遗迹之一，也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员学习基地。

骑白马的彭湃

什石洋村的对面，就是起伏跌宕的大南山。早在1923年，大南山的农民就在彭湃等人的发动下成立了农会组织，农民群众的觉悟很高。当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建立后，1928年年初彭湃亲自带领红四师十一团到达普宁，攻打反动据点果陇村、和尚寮村，以扩大红色根据地。1928年1月至9月间，彭湃的足迹遍布大南山各地乡村。他在什石洋村落脚的地方，便是“蔡元旧屋”。彭湃发表演说：“农民要翻身，就要跟共产党走，只有打倒土豪劣绅，才能分田分地。”他的话深深地打动着村民的心。演讲结束后，军民一片欢腾。

彭湃把红军化整为零，分成若干个小分队，配合当地赤卫队分散活动，化装袭击敌人。他布置各乡农会和农军，采用“坚壁清野”等办法，把敌人拖累拖垮，让他们不得安宁。那时的彭湃，结实的身躯日渐清瘦，却始终累不倒、拖不垮，身上好像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足以应付人世间的千难万劫。

在大南山腹地，有一座幽深的无名石洞，洞口前长着一大片浓郁的密林。穿林而过，迎面矗立着一面石壁。从山上流泻下的山水，经过石壁后变成一道瀑布，像水帘般遮住了洞口，不到眼前根本无法发现。彭湃带着中共东江特委机关便住进了这个无名洞。夜里，蝙蝠成群结队地从洞口飞进飞出。彭湃在洞里指挥战斗，批改公文。他的伙食很不稳定，有时有群众送来些干粮，有时只能煮一锅野菜粥，有时干脆野菜充饥。彭湃不仅是位出色的革命家，还是位出色的艺术家。在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感召下，他创作了很多诗歌和歌谣。在这个石洞里，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地主收租食白米，耕田之人饿走死；土豪劣绅来压迫，匪军又来抢，农民真惨凄。一年到头食唔饱，镰刀放落翁生

丝。俺大家团结起，土豪劣绅来压迫，敌人敢来抢啊，共同合力创死伊！”

早在1926年，什石洋村就成立了党支部，有30名党员；而那些位于龙潭、下坑仔、猴仔窝、猪母窝、老贼营、鸡心山等自然村的村民，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收集情报、筹款送粮。在一次作战中，彭湃的脚受了伤，是大南山的赤卫队员背着他越过山沟，躲过了搜捕。在1930年至1935年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实施大围剿，对山内村庄实行烧光、杀光、抢光，但村民却冒着危险，把粮食、食盐、烟叶和火柴等物资送给山上的红军。有的村民假装扫墓，把猪肉和糕点放在山上的墓地上，让红军取用；有的村民则为红军缝洗衣服，站岗放哨，彻夜不眠。

由于彭湃和大南山人民的团结战斗，使大南山根据地在敌人的“围剿”中不仅生存了下来，还得到了发展，这对于白色恐怖下的全国人民，特别是广东东江地区的人民，是巨大的鼓舞。1928年11月，彭湃告别了生死与共的战友，离开大南山到上海工作。1929年8月24日，由于叛徒白鑫的出卖，彭湃在上海被捕，8月30日在龙华监狱英勇就义，年仅33岁。

喧嚣的市场

当我来到什石洋农贸市场时，发现这里非常繁华，无论是卖菜、卖肉、卖卤味、卖番薯粥的摊子，还是卖干果、卖水果、卖蛋糕、卖烟酒茶的小店，都是人来人往，甚为热闹。2018年，东莞派驻什石洋村的扶贫工作队，借助省产业扶贫资金和东莞市石龙镇引导资金，共550万元建成了这个占地二十三亩的综合市场。现在投入使用的是第一期，占地面积十亩，共有商铺40间，摊档64个，每间铺面的租金从800元至2000元不等，租金收入100多万元，能基本满足周边群众的生活需求。

据驻村“第一书记”黄景庆介绍，贫困户用扶贫资金和集体土地资产作价入股，年终则按股份分享经营收益。目前，市场一期一年的租金100多万。当农贸市场的“造血功能”得到贫困户的认同后，二期工程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计划投资340万元，建设16间二层铺面及配套相关设施。“以前摆摊总会被人赶，能卖的东西种类也比较少，现在有了正规的档口，好多品种都可以拿来卖。”什石洋村贫困户蔡波丰一边剥鸡腿一边说。这个市场不仅改变了村集体经济和贫困户的收入，还解决了大南山大道长期以来占道经营、人车混流的局面，使“脏、乱、差”的面貌得到了有效整治。

什石洋村约有5800多人，耕地面积三百多亩，山面积一万四千多亩。这个村距普宁市区4公里，且位于大南山街道的中心，人口占整个街道的六分之一，但人均耕地面积很少。村民主要依靠务农（种地瓜和蔬菜）及务工维生。由于人多地少，农产品未能形成规模化生产，故而村民的收入较低，村集体收入严重不足。显然，这个村若单纯依靠种植业、养殖业来增收，都不符合村情，而农贸市场建成后，效益显著。在黄景庆看来：“确保贫困户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员稳定就业，是最直接和最有效的脱贫举措。”村里还请专家进行农村电子商务、农产品栽培技术等培训，让贫困户能有一技傍身，便于就业。在工作队的努力下，落实就业的有100人，就业率达近百分之九十。到2019年年底，什石洋村的所有贫困户均已脱贫。

作为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我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长大，切身体会到了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30多年来天翻地覆、日新月异、日渐富强、日渐有国际影响力的变化。走上写作之路后，我深受党的关怀和培养，从一名普通的文学青年成长为一名作家。身为一名文化工作者，我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代，深感自己有责任去全面了解建党百年的光辉历程，从中寻找自己创作的灵感和素材，以文学的形式去展现建党伟业中最动人的奋斗故事。

近几年来，在上海作协的支持下，我先后参与了“红色起点”系列丛书第一期、第二期长篇作品和“红色足迹”系列短篇作品的纪实创作。在这些创作实践的过程中，我有前所未有的体验，有全新经验的积累，有创作技巧的提升，有设身处地的感受，也有身心蜕变的成长。

先说一件最近发生的事。某个周六，我受邀去宝山区的“行知读书会”做讲座，分享自己撰写的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色起点”系列丛书第一期的一本书，书名叫《铿锵序曲——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本书讲述了在中共一大后由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就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我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代表人物李启汉和邓中夏这两位工运先驱的战友情谊、革命历程、情感经历为主线，结合大量史实和细节，来展现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开展工人运动，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艰苦征程和伟大牺牲。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个机构的名称听起来拗口，很难记住，所以我以为自来发听众的读者会比较少。可是当天，有一部分听众是学校组织的中学生，也有不少读书会的粉丝主动报名来听这个讲座。据说此前用公众号推送做宣传的时候，是借了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热度，因为那里面讲了很多邓中夏的事。讲座结束之后，遇上一位自告奋勇的女读者。她对我说：“老师你讲得特别好，尤其最后你分享关于自己和当代年轻人应当如何从百年之前投身革命的同龄人身上汲取信仰的力量时，我很激动，有种心流涌动的共鸣。”每当像这样从读者那里收到发自内心的真诚回馈时，我都感到自己写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我在第一次重要红色选题的长篇纪实创作中，学习和掌握了很多新的创作方法和思路。因为要查阅和消化大量的历史资料，要在符合史实的严谨性和可看性、文学性之间达到平衡，工作进度就很缓慢。但是每往前走一步，我对那个风云变幻、新旧交替的时代就多一分了解；每多走一步，我对自己笔下人物的

想起《回延安》

□刘成章

七里铺的喇叭南桥的锣，贺老当年掐指算，贺敬之那年来过。说不尽这三千六百天。”

就像唐朝的谪仙人，我今回眸路更长，千载浪漫有根根。岁月何处不绝响？

手抓黄土心忆长，当年母亲换新衣，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如今一跃彩云里。

半天里打了一道闪，新城看鸟脚下飞，双手捧定宝塔山。列车取代骡马队。

回水湾里长寸草，山河故人信天游，那时我像只羊羔。亲不够来爱不够。

诗人和韩起祥要合影，心窝上黄土不变味，叫我给他们按快门儿。一丝一缕比金贵。

我请诗人题个字，宝塔山接下的胳膊印，没看出他心里已醉诗。情意千丈它更深。

一月后喜读《回延安》，远方儿女辈辈来，手捧《延河》像吃盛宴。一头扑在亲人怀。

只觉此诗如火烫，不是人人都有缘，哪知它字字连肝肠。心里却都盖宝塔山。

三八枪、老镢头、鱼水情，山上野花滚露水，都在比兴的诗行中。多像贺老眼眶的泪。

前畔的圪针后畔的艾，吃一口洋芋擦擦吃一口瓜，贺老那年才三十二。何人胯下无战马？

时光流逝如脱兔，只要祖国一声令，转眼我已八十五。云飞浪卷嘶嘶风！

纪念日

□张建国

兄弟还是叔叔 换来现在所有的灿烂

我在八岁时 看到您的名字下面写着十八岁 您的年龄被时间一遍遍抚摸 却不敢擅自更改

直到我长过十八岁 长过您 您仍然没能再长一些

我成了姐姐 后来，成了阿姨 直到我以母亲的目光打量您心，很疼……

我能够清晰地记事，大概是5岁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那时50岁出头的春眠爷正担任村支书。因为村里还有焦爷在当着大队长，我们几个小伙伴在割草或者拾麦穗的时候就常常争吵，到底是村支书官大还是大队长官大？

春眠爷在村里出头露面的时候的确比大队长多，比如，敲锣打鼓招呼村民去迎接最新指示；到地里摘了红薯叶，放在大铁锅里拌入小麦麸煮，全村小学生一人一碗，边吃边听他讲旧社会吃不饱穿不暖、忆苦思甜的故事；召开村民生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讲用会，再比如，成立村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小分队……这些都由春眠爷亲手张罗。

而让我感受到春眠爷的正直和对后辈人的爱护，则始于我读小学入队当红小兵这件事。我上小学时约8岁，几乎在跨入校门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少先队员，那时叫红小兵。别的同学拿到新书便领到一条红领巾，颈项而结，佩戴胸前人顿时精神且帅气起来，而我却没有。因为老师正在准备发给我红领巾时，像想起了什么事，突然质疑：“他爸不是参加过国民党军吗？让他参加红小兵，合不合适？”

“那就问问老支书吧。”校长似乎也感到难以决断，“他爸那算啥问题？是为报日鬼子的杀父之仇，被国民党军骗去当兵的嘛。”春眠爷对校长说，很有担当的样子。

原来，我爷爷被黎明前入村扫荡的日本鬼子刺死，父亲为报仇跑到洛阳，寻找抗日队伍，却被正在招兵买马的国民党军官给骗了去。

事情就这么简单，但在那个特殊且不寻常的年代，老师们有所顾忌自是可以理解的。而这件事的经历，倒使我在心里对春眠爷生出隐隐的敬重。我曾好奇地向父亲：“春眠爷为啥叫老支书？”

“他是老党员，又当了十几年的支书，当然该叫。”父亲说。不过，我想问的是“党员”到底指的是个啥？

几位与春眠爷身份相同的党员乡亲们，我相对熟悉的是在村供销社当售货员的周南爷。我们上小学时，用到的东西除了铅笔、毛笔、蜡笔、橡皮，还有一分钱两张的考试稿纸、“田”字格纸、作业本、算盘，三天两头就得往供销社跑。

供销社就在村北街十字路口以东，只有西厢房而没有东厢房的半拉子四合院大上房里，售货进货就周南爷一个人，进货成了让他费心费神的事。进货要到北邻中心村西留石去，大概得走近四里路。如果是进煤油、酱油、醋、甜面酱和盐、锄头、锨、镢头、锅碗瓢勺，这些“汤汤水水”，死沉笨重的东



□谢新源

留痕在心

西，他得拉架子车；如果是毛巾、火柴、肥皂、蚊香、竹筷、笔、本子、糖块，他骑自行车驮着就行了。但令人讨厌的是雨雪天，春天雨势往往不大，但一下就没完没了，一连数日，去到邻村的路路泥泞不堪；夏秋季雨少，可一旦下起来，瓢泼一般，路能变成河，同样叫人寸步难行；冬季常常是雪化成冰、冰化成水、冰、雪、水混作一摊，也是拉或骑不成车的。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形便是：骄阳下，周南爷身穿粗布短褂，头戴草帽，肩搭汗巾，弓背蹬腿，吃力地拉着架子车，艰难地行走在凹凸不平的乡村小道上；风雨中，他手撑一把破旧油纸雨伞，左右肩各挎一只缝缝补补的帆布袋子，脚上被裹着秤砣样的泥坨坨，一步一滑，踟蹰独行……

“咱这供销社，从没缺货过！”周南爷是党员哩，能干得很！”街头巷尾，村人们大凡闲话到周南爷，每每都会这样说。

或是因了诸如春眠爷、周南爷这些党员，平凡、守本分地各自操劳并言传身教地影响着其他乡亲，我们这座古老、偏僻、遥远且质朴的平原小村落里，百姓们的生活就像从她旁边流过的猪龙河水，安然自得，平平静静地过着每一天。我的童年、少年也就在这如此如美的氛围里，不知不觉受到熏染，快乐并无甚忧虑地度过。

1979年隆冬，19岁的我当兵入伍，就要启程的前一天清晨，父亲说：“咱再去赶个集，上车饺子下车肉，今夜叫你妈给你包羊肉饺子。”我和父亲对着初升的太阳，朝村东集镇走去。刚出村，骑着自行车的春眠爷迎面而来，他这是赶完集要回家。

“听说你明儿个动身去部队？”他跳下车，见我穿上了身尚未佩戴帽徽和领章的新军装，满脸和气地问。“是啊，是啊！”父亲倒抢先答道。“那，爷这就有个交代。”我忙点头。“到了队伍上要听党话，干事要舍得力气，最好早些入党。要是你也有了这个身份，过几年假如复员回村，说不定还能加入到咱村党支部里来。支部需要新人，这事很急哩！”春眠爷本来就是个大高个子，脸盘宽阔，凸起的眉毛上，眼眉就像长出的一抹小草，又黑又浓又长，眼睛自然又大，且透出炯炯神气，给人以好不魁梧之感。这当儿，他背着金黄的阳光站立，身影被长长地投射在地上，越发伟岸。

“说的，是说的！”父亲又代我应诺。“爷，我一定会的！”我低声说，而那口气却是坚定的。

我一直记着春眠爷的这几句话，至今都有42年了。只是，我入伍考军校、提干、入党后，并未解甲归田，回到日夜惦念的故乡，而是照着春眠爷的交代，在部队服役到55岁退休这一天。



内心世界和他们在关键时刻所做的选择就多一点理解。他们有的成为领袖的时候跟我接受这个创作任务时年龄相仿，有的牺牲时比我现在还年轻得多。当时社会环境那样险恶，从事革命活动可以说是步履维艰，但是他们却能满怀激情、百折不挠，正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信仰毫不动摇。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能感受到他们内心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做的是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事。反观我们如今的年轻人，虽然生活安稳、物质富足，但反而经常感到迷茫，找不到价值和意义，重温红色历史能帮助我们学习100年前最先进的年轻人身上最可贵的精神。

一方面想要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实，一方面又想要进行文学性的表现，这之间的分寸应该如何掌握令我十分困扰。我在这次写作中十分拘谨，对人物形象的多层次塑造上，对文本结构和形式感的安排与营造上都做得不够好，这一直是我最大的遗憾。之后多次参加关于这套书的交流、座谈、研讨，听取了许多专家、学友、学友的建议，还从其他5位作者那里得到不少启发，比如在动笔之前多花一些时间对当时的国际背景、社会环境、经济、民生、文化等各个方面做充分的了解，还有在这类创作之中，可以尝试通过逻辑的真实去接近历史的真实等等。

从去年夏天到现在，我又在进行“红色起点”系列丛书第二期当中的“一号机密”中央文库选题的创作。这个选题虽然曾经被拍成影视剧，近两年还被改编成了沪剧，但是关于它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建立到上海解放的22年间，在十余位中共地下党以生命守护最终“完璧归赵”的全过程，并没有一部纪实长篇幅进行过较为完整、细致的表现。

总结了前一回的经验教训，此次对这类创作更有了底气。这一次我在尊重史实和人物性格的基础上，采用长篇小说的写作手法。在人物内心的挖掘、情节性的增强、细节的打磨上功

夫，同时也增加了对国际形势、时代背景和生活质感的展现，力求能写出一本引人入胜、令人深思、使人难忘、催人奋进的红色纪实作品。在这几年红色纪实题材的创作中，我一直很注重实地考察和采风，我曾经前往李启汉、邓中夏烈士的家乡湖南省永州市江华县码市镇和郴州市宜章县邓家湾村瞻仰、采风，追寻先烈早年的事迹；还为了写红色足迹的稿子走访过上海市多处红色遗址。在进行中央文库选题创作时，我将曾经保存过中央文库的地址按照它的转移、搬迁路线一一寻访。尽管在此过程中，时常遇上由于各种原因而旧址损毁、拆除甚至无迹可寻等状况，但是也因此而对上海红色历史、红色文化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更对笔下的人物、故事有了身临其境的体味。

有趣的是，不知是天意还是偶然，我发现自己笔下的人物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循着自己的脚步，我几乎能将早期共产党人的革命足迹、心路历程自始至终了解和感受一番。这就使我为自己所从事的创作而感到自豪，也更加觉得责任重大。

开埠以来至今，上海不仅仅是摩登的国际化大都市，也是一座遍布红色足迹的英雄的城市。从中国共产党创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期间我们党的重大事件、进展，很多是在上海这座城市发生的，或者说与上海有着紧密的关联。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如今作为长期生活、工作在上海的青年写作者，我们如何去书写这100年的故事，如何继承和发扬这100年积淀下来的精神财富，直接关系到我们将如何去迎接和创造未来，如今世界正经历着剧变，而中国在复兴与崛起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每个写作者都应该有一种将个人追求与时代发展、国家命运、民族崛起结合在一起创作自觉。